

# 方實與《炎黃春秋》 ——世紀之交的中國故事（上）

● 葉維麗

編者按：由於篇幅關係，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，本期先刊出第一至四節。

我想做一件不易做的事，即在講述父親方實（原名葉篤成）與《炎黃春秋》雜誌（以下簡稱《炎黃》）關係的同時，附帶對《炎黃》早期歷史做一點考證，也談談我對「《炎黃春秋》現象」的理解。

我父親於2005年8月在《炎黃》雜誌社副社長任上倒下，時年八十八歲，在雜誌第一線堅持工作凡十四年。父親被中風擊倒後嚴重失語，之前他未對我專門講過《炎黃》，之後我也不能去問他了。最近讀到陳岱孫先生的《往事偶記》，其中在提到二十世紀20、30年代清華大學理學院的一批學者和一些事迹時，說了這樣一段話：「這種慘淡經營的過程是沒有甚麼檔案可查的。時間一久，就容易為後人所不了解或者忘記。」<sup>①</sup>我想，這個說法對《炎黃》或許也適

用。關於這份雜誌，人們已經說得很多，看法見仁見智；我看《炎黃》自有我的角度。我無力也無意對它做深入系統的研究評價，我關注的重點在1991至2005年，那是《炎黃》從初創到在經營上站穩腳跟、在內容上形成特色、在理念上逐漸自覺的最初十四年，也是父親有質量生命的最後十四年。

我視《炎黃》為父親的精神家園，它也是與父親同時代一批老人的精神家園。作為女兒和晚輩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，我對這份雜誌懷有很深的感情。同時，我是學歷史的，對被稱作「『一二·九』/『三八式』」<sup>②</sup>的一代中共黨人特別感興趣。寫這篇小文，我既帶着女兒和晚輩的情感，也帶着審視者的目光。本文在四個「基於」的基礎上寫就：基於父親在《炎黃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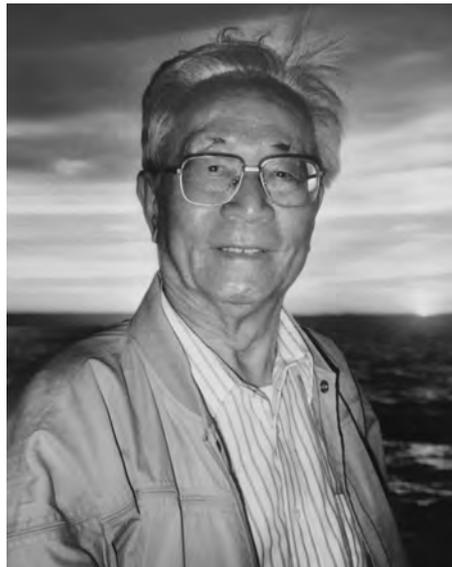
\* 本文初稿寫於父親方實去世不久後的2016年夏，此後《炎黃春秋》發生的巨大變故沒有改變我的基本思路，定稿在初稿基礎上修改完成。2006年以來的十餘年間我曾陸續對多人進行採訪，在此我願對接受採訪的各方人士表達誠摯的謝意。

工作期間我本人的目睹耳聞，包括我出席《炎黃》活動時作的筆記；基於我自2006年以來十餘年間對多人進行的訪談（面談或電話）<sup>③</sup>；基於大量相關出版物；也基於父親本人的有關記述，以及他病倒和去世後我整理出的家中與《炎黃》有關的材料。我接觸和了解的十分膚淺片面，再者，如何述說一份多年來處於爭議漩渦中的刊物也是一個難題。然而，哪怕純粹為了緬懷自己的父親，我也繞不過這份他曾以全副身心投入了晚年生命的雜誌；更何況，《炎黃春秋》的意義超越了一個人甚至一批人。那麼我就勉力為之，寫一寫方實和《炎黃》的故事。我寫歷史，關注時代背景/語境以及事物演變的過程，雖然這不是一篇歷史論文，我也會有所留意。

《炎黃春秋》創刊於1991年夏，它的誕生與當時中國的社會氛圍、人心態勢息息相關；它的中堅，是一批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、1980年代起開始思索「中國革命」複雜遺產的老共產黨員，《炎黃》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反思平台。1990年代初參與搭建這一「平台」的是幾路人馬。我的《炎黃》故事從1980年代講起，從「幾路人馬」的來龍去脈及最終「匯合」講起，涉及我父親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一定意義上，我是在試圖梳理中共黨內一部分「反思派」的譜系。

### 一 李維漢與溫濟澤/ 《革命烈士傳》與 《中華英烈》

父親於1982年六十五歲時從新華社黨政部門負責人職務上退下以後，沒有閒着，他先於1983年參與



方實（圖片由葉維麗提供）

編撰十卷本《革命烈士傳》（以下簡稱《烈士傳》）<sup>④</sup>，後於1991年參與創辦《炎黃》，兩處工作時間加在一起共二十三年。父親退而不休，晚年生命十分出彩。

《炎黃》誕生的時代背景和語境至關重要，要回溯到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代，從《烈士傳》叢書的編撰講起——《炎黃》創刊時，用的是《烈士傳》編委會旗下刊物《中華英烈》（以下簡稱《英烈》）的刊號，因此，簡要地介紹已經鮮為人知的《烈士傳》和《英烈》雜誌，就有必要了。

《烈士傳》的緣起頗帶改革開放初期時代特色：1978年，由個人——中共元老李維漢——倡議編撰，得到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喬木的支持，胡並作出批示：不給編制，不給經費，不給辦公室。由於有黨研室的認可，此後編書過程中《烈士傳》編委會還是得到了各地有關部門的協助。編輯人員主要是在北京「自帶乾糧」的離休幹部，符合胡喬木定下的「三不給」原則。

這裏我想請溫濟澤出場，他是《烈士傳》編委會主任，對《炎黃》的面

世也起了關鍵性作用。溫濟澤為人低調，得替他「宣傳」一下，需要被「宣傳」的，還有溫濟澤背後李維漢。李維漢1984年去世，與《炎黃》的面世無關，但將他視作文革後勇於總結歷史教訓的第一位中共元老，應該是恰當的。1980年5月某日，李維漢與鄧小平長談四小時，講到中共黨內個人權力過份集中、個人崇拜、「家長制」、「封建主義」影響等問題。李維漢對之後前來看望他的溫濟澤興奮地說，「小平都同意了」。同年8月18日，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，裏面吸收了李維漢的意見，尤其是李對中共黨內「權力過份集中」和「封建專制主義影響」的批評<sup>⑤</sup>。鄧講話的主旨是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」，可見總結歷史教訓與現實制度改革有着聯動關係。一晃幾十年過去了，鄧公當年的講話幾成空谷足音，李維漢的推動之功也鮮為人知。

反省過往、改正錯誤，要從自己做起，延安整風期間李維漢曾在中央研究院主持批判王實味。晚年李維漢念茲在茲的一件事，是為王實味平反。他從1981年起即向中央組織部提議，但進展不順；1984年夏病危時，他將此事交託給溫濟澤。溫經過「再三努力」，終於在1991年得到公安部門對王實味的平反決定。

此前的1978年，李維漢生出要為在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」犧牲的烈士立一「比較完整、系統」的傳記的想法，這時距他文革後恢復自由還不到一年，延安中央研究院時期的部下、剛剛被「第一個平反的右派」溫濟澤去北京醫院看望他。多年後再次見面，瘦骨嶙峋、「腰彎到幾乎90度」的李維漢就提出要溫濟澤主持編撰

一套新的烈士傳記，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溫濟澤接下了這份額外任務，於1979年開始籌劃，1981年成立編輯組（1983年擴大為編委會）。1984年李維漢去世前夕，溫濟澤告訴他《烈士傳》第一卷即將發稿，李握着溫的手斷斷續續地說：「這……件事……就……託付……給你們了。」

李維漢晚年有兩大心願，一是編《烈士傳》，二是寫回憶錄。他在耄耋之年寫出上、下冊《回憶與研究》<sup>⑥</sup>，立下文革後中共高級領導人撰寫回憶錄的「首創之功」。雖然行文思路難免有「黨八股」遺風，但他在書中對中共歷史上多次「左」的慘痛教訓進行了嚴肅認真的反思，對自己參與其中的，不憚坦誠地自我批評。有評者認為，「晚年李維漢顯示出特殊的清醒」<sup>⑦</sup>。

臨終前不久李維漢寫下一首詩，其中有這樣一句：「我是採薪憂不盡，殘年有志惜晚晴」<sup>⑧</sup>——請注意，這裏是「憂」。李維漢和溫濟澤代表了前後兩代有良知的共產黨人，他們自年輕時即投身中共革命，歷經艱難曲折，文革後，兩人的政治生命均獲重生，年已八十開外的李維漢致力於對中共歷史的回眸與反省，並對六十開外的溫濟澤委以重託。梳理他們之間的承續關係，也是梳理文革之後中共黨內中高層「反思派」的譜系。《炎黃》做的一件重頭之事是反思歷史，而反思之業在倡導「思想解放」的1980年代就開始了，多源頭的活水已在潺潺流動，李維漢—溫濟澤是其中重要一支。1990年代《炎黃》的面世可謂諸流匯集、水到渠成。

我父親在1940年代延安時期就認識溫濟澤，那時溫在《解放日報》社，父親在新華社，兩個編輯部同在清涼

山上。他倆真正熟悉是在1947年從延安撤退的路上，白天一道行軍，晚上睡一個土炕。小溫伯伯（這是我對溫濟澤的稱呼）在1999年夏去世後，父親回憶當時的情形：「一路上大家說說笑笑。我和溫濟澤同志很說得來，我們很快就熟悉了。」<sup>⑨</sup>父親還說，我和溫老不但有深厚的戰友之情，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政治觀點、思想認識，對當前形勢和社會環境的看法也是相同的。因此，我們兩人可以交心，可以說是無話不談。

父親記得，1982年的一天，溫濟澤打來電話，說要編寫一部新的烈士傳記。雖然有黨研室的「尚方寶劍」，但具體操作要由溫自己想辦法。因為不給編制，他只好向老熟人求援：通過我父親，動員了二十幾位新華社各部門離休幹部；通過解放軍出版社社長黃濤，動員了其他單位的離休人員。上一次比較系統完整的中共烈士名錄編撰還是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，編撰一部新的烈士名錄及傳記，不僅需要擬定名單，也需要寫內容，工作量很大；而對入傳人物的選擇（共一千名左右），則編撰者不僅需要熟悉中國革命史，更需要有公正開放的態度。經過五六年的耕耘，十卷本《烈士傳》於1988年編完，1992年全部出齊。可以說，《烈士傳》是在1980年代那樣一個時代，由一批不為名利不計報酬的老共產黨員歷盡辛苦、克服重重困難成就的一件事，放在今天是難以想像的。

李維漢對《烈士傳》的設想，是不光寫領導人，也要寫普通一兵；不光寫共產黨人，也要寫「革命群眾」和為國捐軀的非黨人士；不光寫中國人，也要寫在中國土地上犧牲的「國際友人」<sup>⑩</sup>。這樣一個涵蓋面頗為寬泛的設想，或許與李維漢曾擔任中央統

戰部長多年有關，也或許與他對廣義的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思考有關。無論怎樣，李維漢對「革命烈士」的界定已經突破了狹隘的中共一黨窠臼。

翻閱《烈士傳》，我的感覺是「相當主旋律」，但其實它的編輯理念已經包含了深刻的變化。新華社國內部老編輯方煌告訴我，編輯人員在收集資料階段遇到一個問題：被自己人殺害的算不算烈士？最終中組部和《烈士傳》編委會共同決定：算。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突破，與這一時期「平反冤假錯案」的精神一致。十四五歲參加新四軍、文革中被誣為「叛徒」的方煌說，編《烈士傳》過程中，她結合自己的經歷，「容易產生共鳴」，也「受到了很多教育」。後來方煌參與了《炎黃》稿件的編輯工作，她說，編《烈士傳》為她編《炎黃》做了思想準備，這兩件事在她的一生中「最值得驕傲」。

作為《烈士傳》編委會副主任，父親應當參與了做出「被自己人殺害的也算烈士」的決定。《烈士傳》的編務讓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的父親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——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，他開始比較全面深入地了解 and 認識自己曾參與其中的「革命」，在這個過程中，他既受到先烈精神的感召，也須直面革命歷程中的陰暗面，這應該為他後來編輯《炎黃》打下了底子。參與《烈士傳》工作開啟了父親非常有意義的晚年生活，此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裏，從《烈士傳》/《英烈》到《炎黃》，父親的生命融入了一股歷史的潮流，進入了一個愈來愈廣闊的天地。

1989年的「六四風波」給予父親極深極痛的刺激。一貫謹小慎微的他，在跟我的越洋通話中毫不掩飾憤怒，指名道姓痛斥曾在新華社工作過

的那位時任「發言人」。我在1980年代初即出國留學，不十分清楚父親退休後的情況，那天放下電話後，我想：老爸有變化了，他不怕了！深受「六四風波」刺激的絕非父親一人，1990年代我去看望溫濟澤，他反覆對我說，他一定要活着看到六四「平反」的一天。

我聽到了兩位老共產黨員的心聲。其實，中國的很多事是「於無聲處」。「無聲」不意味着「無有」，往往更加熾烈；人老了不等於淡漠了，也許會更加較真。文革「浩劫」加上「六四風波」，再加上「參加革命」幾十年來經歷的風風雨雨，父輩中的一些人在生命的晚年之際，欲罷不能，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後，他們逐漸形成一道奇特而醒目的中國「風景線」，令我每做回望，都慨歎不已。

「六四風波」之後，發行了四年多的《烈士傳》旗下刊物《英烈》被停刊整頓。當時父親擔任該刊副主編（主編為溫濟澤），廖蓋隆、黎澍、李銳等《烈士傳》編委兼任編委，但真正為《英烈》組稿編稿、幹活出力的是一批以「老三屆」為主的中青年。在2016年的電話訪談中，實際領頭人秦曉鷹告訴我，「老同志們很好」，編委會定下大政方針，具體業務交給他和他的同伴。像《烈士傳》一樣，《英烈》也是「三不給」，編輯們業餘奉獻，下班後「再幹八小時」，收工時往往已是滿天星斗。這份刊物在眾多出版物中獨樹一幟，秦曉鷹說，他們力求擯除「官話套話」，以「要把人性寫出來」為追求，筆下的革命者有血有肉，有痛苦，甚至有動搖，「搞黨史的不敢發我們發」，「讓人們意識到歷史還可以這樣寫」。他們不但力求秉筆直書中共人物和事迹、敢於直面「太陽中的黑子」和曾被掩飾的「污

垢」，還比較早地講述「正面戰場」在抗戰中的犧牲與貢獻：一篇記述對日空戰的文章令一位在台灣的前國軍中將閱後「失聲嚎啕」。幾年下來，《英烈》贏得了社會聲譽，黨史學者高華看了裏面的文章後「激動得不得了」<sup>⑩</sup>。

父親是喜愛這份雜誌的，對它被停刊很惋惜，並說，「《炎黃春秋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《中華英烈》的續刊」。這樣講有道理，不但因為《炎黃》繼承了《英烈》的刊號，還因為在對歷史求實存真方面，1980年代出版的《英烈》已經抱有這種追求——那一番，是在「老同志們」的支持下，一批「老三屆人」的衝鋒陷陣。

「六四風波」之後被停刊的還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屬下刊物《炎黃子孫》，原總參政治部主任馮征是該委員會副主任<sup>⑪</sup>，由於馮的關係，《炎黃子孫》也成為《炎黃春秋》的奠基雜誌。《炎黃春秋》是在這兩個刊物的基礎上成立的。1991年7月《炎黃》創刊號中表示，雜誌將「保持並發展原《中華英烈》和《炎黃子孫》的風格特色」<sup>⑫</sup>。

## 二 炎黃文化研究會／蕭克與杜導正

1990年，一個名為「炎黃文化研究會」的機構正在醞釀中，它的前身是「炎黃二帝塑像籌委會」，該會於1980年代由河南某人發起，他想要在黃河岸邊立炎黃二帝巨型塑像。到了1990年代初，北京一些支持人士的心思已經不在二帝塑像上，此刻，如何凝聚海內外人心成為巨大挑戰，高舉「民族主義」、「愛國主義」旗幟似最合時宜，「炎黃文化」之稱則最具包容性。在這一新形勢下，「中華炎

黃文化研究會」(以下簡稱「研究會」)於1991年5月正式成立。研究會需要一份會刊，此後出現的《炎黃春秋》雜誌實為研究會屬下刊物，後者在相當長時間裏是前者的「主辦單位」，並於2004至2014年兼「主管單位」。策劃辦刊過程中有一次在開國上將蕭克家開會，與會的幾個人對辦甚麼樣的會刊有不同設想。杜導正後來回憶，他當時表示對辦「學術性刊物」興趣不大，要搞就搞「說點真話的東西」，把刊物辦成「時政性」的，研究一二百年來「中華民族和我們黨的歷史教訓」。幾人中，杜導正為老報人，由他擔綱辦雜誌順理成章。杜後來說，是蕭克點了他的將。

蕭克擔任研究會執行會長，會長為周谷成，名譽會長為薄一波和美籍華人李政道——從領導成員的成份看，研究會雖為一家「民間文化團體」，實帶半官方色彩，兼具學術性和統戰意味。「弘揚中華文化」為該會的基本宗旨，這從該會成立後擬定的系列講座題目可以看出：有李學勤講「傳說中的炎黃二帝」，張岱年講儒學，還有蕭克講孫子兵法和古代兵家等等。如果沿此思路辦刊，自然要強調「中華文化傳統」。杜導正表示對辦「學術性刊物」興趣不大是有所針對的。同時，也很難說在策劃階段，蕭克本人對會刊的定位有多明確。似乎可以肯定的是，既然由杜導正擔綱辦刊，他的意見就格外重要，他想辦的刊物，與研究會重視研究、弘揚「傳統文化」的意向並不合轍。

杜導正(我稱為「老杜叔叔」)是一位值得書寫的人物。杜在抗戰初期少年時代加入共產黨，是在中共隊伍中成長起來的「娃娃黨」，他既能武又能文，參加過武工隊，在戰爭中摸

爬滾打，練就一身膽量；又因為他父親是鄉村文化人，他自己的文字功底也了得，從給《晉察冀日報》寫稿做起，逐步成為正式記者。中共建政後，他長期在南方工作，擔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，其間，因向新華總社反映大躍進後廣東農村的真實情況而被打成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」，一度被撤銷黨內外職務(同時被打成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」的還有其他六位新華分社社長)。杜導正說，經過這次挫折，他「獨立思考多了，盲從性少了」。在分社社長任上，杜筆頭勤，腿腳也勤，基層和上層都能跑，既接地氣、了解廣東各地民情，又因職務之便，知曉上層信息，與中南局和廣東省委領導保持密切聯繫。因為是記者出身，他對時事政治具有非常人的敏感，不但如此，他更是個勤於思考、善於分析問題、有「大局觀」的人，這方面能力在中共幹部中當屬上乘。這些品質在他辦《炎黃》時都派上了用場。

改革開放之初，杜導正從廣州調入北京，從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到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再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，一路順風順水。從得風氣之先的廣東到在中央宣傳出版部門擔任要職，杜導正的視野更為開闊，思考的問題也更具全域性。

1989年夏，杜導正被免去署長職務，在體制內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。但他不是個閒得住的人，對國家政治的關心幾乎出自本能。在他看來，「六四風波」之後的中國大有倒退之勢，有人在竭力否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訂的改革開放路線。北京的官職丟了，他在地方還有人脈，1991年初，他走訪廣東，寫下一篇珠江三角洲採訪札記，受到曾任廣東

省委書記的任仲夷稱讚，在當地報紙發表時，用了「中國改革開放不能倒退」的通欄標題。以杜的經歷及其與1980年代中共高層的關係，他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有種近乎「個人」的認同，當他說辦雜誌就要辦個有「時政性」、「說點真話的東西」時，是有潛台詞的。

辦刊物須有刊號，杜導正當時身份敏感，未必容易拿到。《英烈》雖然被「停刊整頓」，但刊號仍在。四處奔走近一年爭取復刊不果後，溫濟澤同意將《英烈》刊號「讓給」醞釀中的《炎黃》。轉讓刊號須經出版總署批准，經辦此事的是時任總署副署長的王強華。在紀念《炎黃》創刊十五周年的會上，王特意說明當年情況，提醒大家不要忘記已經去世的溫濟澤<sup>④</sup>。

據我所知，杜導正和溫濟澤沒有歷史淵源，他們之間的牽線人應為方實——將難以復刊的《英烈》與正需「准生證」的《炎黃》連結在一起的，應該是我父親。方實與杜導正相識多年，兩人關係於公於私都不錯。新華分社的業務報導歸總社國內部管，文革前父親是國內部負責人之一。文革後的1980年代，我們兩家一度是鄰居。我曾問過杜導正，我父親是怎麼參與創辦《炎黃》的，他回答：「老同志之間接觸很多。」中國的事情，「關係」很重要，當然，比「關係」更為重要的是共同的理念和追求。在1990年代初的時代背景下，杜、方可以說是一拍即合。杜導正告訴我，「我們兩個是最要好的，無話不說，在緊要關頭，可以說我倆的觀點一模一樣」。

在父親留下的材料中，有一份研究會寫給「主管單位」文化部〈關於接辦《中華英烈》雜誌申請報告〉的起草稿，其中正在籌備中的會刊擬叫《炎

黃文化》，與研究會名稱一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稿中「炎黃文化」字樣一共出現六次，每次都有同一個人將「文化」兩字塗掉，改為「春秋」——《炎黃春秋》刊名即由此而來。我對父親的筆迹非常熟悉，一看即知「春秋」兩字是他寫的。將「文化」改為「春秋」很可能不是父親個人的主意，但在《炎黃》尚未面世之際，父親參與了為它命名——更加準確地說，為它更名的過程。這一更動可圈可點。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「春秋」二字的含義和分量。孔子作《春秋》微言大義，體現的是剛直無畏的史家精神，令國人世代敬重。也許，《炎黃春秋》是銜着使命出生的。

父親曾簡要敘述參與創辦《炎黃》之事：「在《革命烈士傳》即將編撰完成之際，1991年7月，我協助杜導正同志參加了創辦《炎黃春秋》的工作。」我想，父親應是以原《英烈》副主編身份加盟的，主編溫濟澤擔任《炎黃》特邀編委，不參與雜誌社日常工作。杜導正對我說，創辦之初，「就是我們兩個人〔他與我父親〕，加上《炎黃子孫》的洪爐、杜衛東、劉家駒」。雜誌社第一任總編洪爐是由參與策劃辦刊、擔任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的馮征介紹來的，洪爐不是原《炎黃子孫》的人；杜衛東和丁洪章是，丁一度擔任《炎黃春秋》副社長，但對具體事務參與不多。雜誌出了一期後，曾在《解放軍文藝》社工作的劉家駒進來了。洪和劉都有部隊文化工作的背景，他們兩位加上原《炎黃子孫》副主編杜衛東負責《炎黃春秋》編務，三人與杜導正和方實沒有歷史淵源。負責雜誌社日常事務和經營管理的分別是宋文茂和徐孔，他倆此前就認識杜導正，宋曾任首都師範大學

紀委書記，徐原為《中國食品報》負責人。這就是《炎黃》最初的社務和編輯班子，多數人彼此並不相識。

1991年《炎黃春秋》雜誌社成立時，社長杜導正六十八歲，副社長方實七十四歲，宋文茂和徐孔也均已年過六旬。

### 三 「到了不好開口像是笑話的程度」

我聽到一個說法，認為《炎黃》由於有前中共高官坐鎮，又有「大佬」撐腰，從一開辦就比其他雜誌順遂得多。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，《炎黃》初辦時條件之艱苦，用杜導正的話說，「到了不好開口像是笑話的程度」。雜誌社成立十周年時，回望走過的道路，杜導正以《〈炎黃春秋〉的春秋》為題寫了一篇文章，提到當初在方方面面的「困難、曲折、微妙以至心酸處」，欲說還休，以「跌跌撞撞」一詞而蔽之<sup>⑤</sup>。

《炎黃》正式出刊前，雜誌社先是在位於北京景山的少年宮租了幾間半地下室屋子，光線差，看稿子得到戶外，蕭克來視察時說，比根據地強多了。桌椅是從原《炎黃子孫》搬來的，後來馮征又送來幾張舊桌子，上面黏着文革中的殘餘大字報。幾個月後雜誌社搬到北窪路首都師範大學附屬中學一座樓的二層，樓道裏常飄着飯味兒。一年後搬進原北京圖書館一棟「冬冷夏熱」的老樓，幾年之後又搬到雍和宮附近的戲樓胡同。在戲樓胡同時，剛退休的楊繼繩去過，他對我說，那裏「條件太差」，加上要乘地鐵過去，感到對我父親實在不便。直到2002年搬進月壇西華賓館院內

的簡易小樓，《炎黃》雜誌社才算是安頓了下來。

到過月壇小樓的人知道那裏條件怎樣。文革前還是孩子時，我去過父親在新華社的辦公室，杜導正退下前的工作環境應更不待言。豪華以至奢侈是當今的世風，可是有這麼一家雜誌，在一處又一處堪稱陋室的地方堅持多年，我從未聽父親有過任何怨言。這裏說句題外話：我弟弟葉維佳曾任外企高管，後來離開那份報酬豐腴的工作，創辦一家名為「道和」的綠色環保機構。弟弟去世後我到過他們的辦公室，只有一間小屋子，幾張舊桌子。父子倆做人做事可有一比。

熟悉1990年代出版情況的吳思對我說，當時社會上冒出不少民間刊物，但逐漸地，它們或是斷了資金來源，或是因為內訌散夥，或是由於「犯規」被封，眼看着一個個都辦不下去了。由此讓我想到，要辦成一本雜誌，錢、人、「不犯規」，三者缺一不可：「錢」指與市場的關係，「人」指內部人際關係，「不犯規」則關涉雜誌社與政府部門的關係，《炎黃》要生存下來，必須處理好這三個基本關係。

先說錢，茲事體大。體制外的《炎黃》不是新華社或《光明日報》，不能不講「市場經濟」，杜導正和方實這樣的「老革命」可說是「遇到了新問題」。最初，雜誌社通過研究會的途徑得到一些錢，但數額有限，杜、方二人曾共同出面借款，這筆錢很快由我父親代表雜誌社簽字還清。第一任總經理徐孔告訴我，在景山公園半地下室時，因為資金尚未到位，連房租都無法預先支付；為了招待蕭克，專門上街買了二兩茶葉。此後一直到1994年初，雜誌社在經濟上始終處於不穩定甚至岌岌可危的狀態。

1993年最為困窘，雜誌社想出用「拉贊助」方式「開源」，當年7月，雜誌版權頁出現「理事會」字樣，出3萬元可以當理事，出5萬到10萬元就是副理事長（理事長是杜導正）。1994年5月起，「理事單位」名單中出現了一家大國企，該單位負責人是我的一位表哥，這個贊助是我父親「拉來的」。徐孔說，這家企業先後共贊助10萬元。按規定，我父親應得百分之二十的「回扣」，但他「說甚麼也不要」，最後「強迫」他收下了5,000元，「他給了天津一個甚麼學校」（應是作為「葉氏五兄弟獎助學金」捐給父親的母校天津南開中學）。徐孔接下來說：「為甚麼這麼困難，大家思想還這麼一致呢？就是領導帶頭，大家都沒有私心。」

即便領導帶頭、大家思想一致（其實並非那麼一致），情況也沒那麼簡單，不會經營也不行。以印刷為例，雜誌出版的頭三四年先後換過十二家印刷廠，足見情形之混亂。一本不為人知的刊物，要找到相對穩定的印刷廠，開闢相對可靠的發行渠道，銷售一定數量的期刊以保本，做到其中任何一項都不容易。初生的《炎黃》只能依靠四面八方、良莠不齊的社會力量，在1990年代中國「市場經濟」的風吹浪打中勉力圖存：一個報亭一個報亭求人代賣的事有過，賣了雜誌收不回錢雞飛蛋打的事有過，在外地印刷的雜誌運輸途中遭雨水浸泡的事也有過……細說下來，是一個長長的故事，這裏只撿幾件格外「精彩」或是「出格」的事講講。

1993年初，雜誌的印刷和發行事務由社外某人承包，此人品德有疵，不付印刷廠工錢（雜誌社不知情），致使1994年夏的一天上午，該

印刷廠幾個大漢打上門來要錢，他們搶圖章，摔茶杯，指着老人的鼻子罵，抄起椅子要往副總編杜衛東頭上砸，並揚言到杜導正家吃飯睡覺，一連數日「討債隊伍」不斷，弄得雜誌社無法工作。這家印刷廠屬於部隊系統，杜導正說，為了解決問題，他和我父親曾去找有關部門，兩個老頭兒被一個「高高在上坐在桌子後面」的軍人訓斥了一頓。那個引禍的承包人不僅欠印刷廠工錢，也給讀者少寄漏寄遲寄雜誌，他賣刊得錢後不上繳雜誌社應得份額，還在解除承包關係後攔着訂戶信息數月不放。從1994年開始，雜誌社和此人打了多年官司，雖然從一開始就穩操勝券，但與「小人」打交道絕不是件愉快的事。

由於印數少，《炎黃》只能通過「二渠道」（民間書商）發行，賣多賣少由他們說了算，雜誌社連維持日常運作都有困難。1993年下半年，杜衛東想出利用郵局直接徵訂的點子，這就必須保證雜誌有相當的發行人數，否則除去郵局提成，雜誌社連成本都保不住。一時間，《炎黃》不大的辦公室裏堆滿了印好的徵訂單，包括杜導正和方實在內的雜誌社全體工作人員，加上從外面請來的大學生，按照郵局編碼本提供的信息，用最「笨」的辦法一封一封寫信封，向全國各地學校、機關、廠礦、圖書館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寄徵訂單，總共發出五六萬封徵訂信；同時，雜誌社借用北京圖書館一間比較體面的辦公室，由社長杜導正出面在中央電視台頻道上推介《炎黃》。之後，就是焦急的等待。當終於得到來自郵局的徵訂數字時，杜衛東一聽就哭了，打電話告訴徐孔，徐「半晌不說話，終於開口時說：『總算熬出來了』」。

1994年第一期《炎黃》在〈編者寄語〉將這個好消息告訴讀者：「從郵局傳來信息，在期刊訂數普遍大幅度滑坡的情況下，《炎黃春秋》剛交郵局發行，訂數就相當令人振奮。我們所有的苦累，都在那一張張訂單中稀釋了。」<sup>⑧</sup>多年後讀到這段話，我仍然有鬆了一口氣之感。

《炎黃》成立五周年的1996年，雜誌的發行量超過五萬份，除去開支已略有結餘，在其他方面也走上正軌。這時或因人際關係、或因其他因素，最初的總編洪爐和副總編杜衛東或淡出或離去。平心而論，洪爐和杜衛東在《炎黃》創辦初期都做過貢獻。洪爐審稿認真，「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」；杜衛東對開關和擴大《炎黃》訂戶功不可沒，為雜誌社財務打下了基礎，徐孔對此充分肯定。不僅如此，1993年胡耀邦去世四周年時，《炎黃》發表了幾張胡耀邦的照片和一首短詩，詩作者正是杜衛東<sup>⑨</sup>。這是自1989年夏以來國內媒體上第一次公開紀念胡耀邦，也是《炎黃》首次在「時政」問題上發聲，是要承擔風險的。紀念胡耀邦的決定是「老杜」做的，但那一期的責編是「小杜」，他的詩感情真摯，絕非「遵命文學」。杜衛東於《炎黃》創辦之初即來，1994年底離開，經歷了雜誌社最困窘艱辛的創業階段。在2016年我對杜衛東的電話訪談中，他沒有掩飾離開時有過不滿，但也對「老同志們」表達了在我看來是大度的理解：「老同志們是想幹事」，「他們不是為自己，是從雜誌社發展考慮」。我們談話的開頭，杜衛東淡淡地說了一句，「我參與了創辦《炎黃春秋》」。了解了各方面情況之後，我認為他有資格這麼說。

《炎黃》成立之初，領導層人際關係沒有充分理順，杜導正和方實的

職能不甚明晰。因為辦公桌有限，一開始分配桌子時沒有他倆的份兒。有人認為，杜和方就是掛名，不會做實事的。杜導正說，那時他和我父親「忍辱負重」。即便如此，杜、方也堅持上班。杜衛東告訴我，他倆「從來不是掛名」，「具體事務、包括終審都管」；他還說，「組稿主要是老頭們，他們認識親歷者」，並以我父親為例，說他常在開會時打開皮包，說，「我這裏有幾篇稿子」。雖然早期《炎黃》摻雜了其他內容和風格的文字，封面上也沒少登令杜、方「看着不順眼」的明星美女照，但從一開始，這本雜誌就以刊登歷史親歷者的文章而別具一格，對此，有心的讀者注意到了。

進入1995年後，《炎黃》明確了以「紀實」為特點的辦刊風格，編輯部在當年第一期開宗明義：「尊重史實……是本刊辦刊的基本原則」，「補正史之遺闕，校傳聞之謬誤，是我們的願望與職責」<sup>⑩</sup>。由於此前登過帶文學色彩和「軼事」性質的文章，編輯部在同期另一處強調，今後來稿「內容必須真實，不得虛構」<sup>⑪</sup>，這一原則成為《炎黃》的「品牌」要素。此時，雜誌社以杜導正為主、方實為輔的基本領導格局已然確立。

#### 四 「司令員」與「政委」

寫到這裏，說幾句雜誌社內部的人事，即前面提到的三個基本關係中的「人」。我不是雜誌社裏的人，只能說說我在父親病倒和去世後所了解的、涉及到我父親的一點情況。

《炎黃》是一家沒有「編制」的體制外單位，說它的人員是拼湊起來的應該符合事實，尤其在前期。講一個

我知道的情況：我一位同學是文革前「老高三」生，我父親看過她寫的東西，了解她的文字水平；1990年代末她退休了，父親聽說後通過我問她，能不能來給《炎黃》當編輯。這反映出雜誌社當年招收工作人員的方式不那麼正規。再者，在相當長時間裏，雜誌社在收入方面毫無優勢，開始時杜導正和方實每月補貼費是40元。創刊之初即在《炎黃》做打字等雜務的趙凡響說，開會時領導常說，「我們有工資福利，要多考慮把《炎黃》作為第一職業的人」——即從社會上聘請來的人。退休前任《光明日報》總編室主任、1999至2003年任《炎黃》副社長的程理嘉告訴我，在他工作期間，雖然雜誌在社會上已有不小的影響，但還是不能「指望它吃飯」，當然，年輕人更不能指望通過它拿到職稱，更不要說分房子等福利了。

前面說過，《炎黃》初創時大部分人互不相識，之後人員的進進出出也較「正規」單位頻繁，歷年的工作人員既包括像杜衛東、吳思及徐慶全這樣脫離或游離於體制外的「知識精英」，也包括曾在中央機關、部隊系統和其他部門工作過的離退休幹部，如洪爐、劉家駒、程理嘉、郝愛存、楊繼繩、胡竟成、趙友慈和李晨，以及從社會上聘請來的人，如王海印——這位年輕人是在《炎黃》成長起來的。曾在雜誌社工作過的人員名單不短，為它出過力的人不少，恕我不一一列舉。總之，「炎黃人」來自「五湖四海」，背景經歷各異，年齡參差不齊，思想理念也未必那麼一致。

前引吳思的話，說1990年代出現的很多體制外刊物後來辦不下去，其中一個原因是「內訌」，可見處理好內部關係的重要性，處理得不好，

輕則影響士氣，重則關乎一份刊物的生死存亡。

在曾經長期擔任編輯室主任的趙友慈眼中，《炎黃》雜誌社是個「好人集中的地方」，是一方中國社會「少有的淨土」，也是一座使人素質和思想都能得到「冶煉」的「熔爐」。趙友慈於1994年自中央美術學院教職退休後到《炎黃》上班，2008年離開。「淨土」的說法有些溢美，誰不知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「事兒」，但趙的感受也是實在的。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的形成仰仗眾人的合力，《炎黃》的每位工作人員都為此做出了貢獻，這裏我僅講一點與我父親有關的情況。

體制外的《炎黃》沒有專門負責「思想工作」的人。在和不同時期的數位工作人員交談後，我得出一個印象，即我父親在一定程度上非正式地擔任了《炎黃》內部的「思想工作」。在雜誌社2016年2月為父親召開的追思會上，軍旅出身的劉家駒這樣說：方老「像政委，仁慈，我對他有一種特殊的感覺」；長期擔任雜誌社社長助理和辦公室主任的胡竟成重複了「政委」的說法：「杜老是司令員，方老是政委，有難題，都交給方老處理，……方老待人謙和，辦事有原則，能聽取不同意見，為雜誌社的團結起了大作用。」

「政委」一詞讓我心中一動。劉家駒在《炎黃》工作了十二年半，長期擔任執行主編，他性格耿直，有時會在稿件問題上與他人發生爭執。追思會那天他說，他心裏有疙瘩時願意找我父親談，我父親給他做工作，「講延安，講慢步走」，語言表述的方式讓他「心悅誠服」。

在訪談中，杜衛東也講了我父親是怎麼給他做工作的。因為社裏一項

決定，杜感到鬱悶壓抑，一夜無眠，挨到清晨6點給我父親打電話。杜衛東告訴我，他私下曾往我家打過多次電話。我問為甚麼要給我爸打電話，他回答，「方老正派，和藹，寬厚，沒架子，值得信任」，「他講的道理我能聽進去」。後來杜衛東選擇了離開，沒有說過不利於《炎黃》的話。杜衛東還說：「方老是雜誌社的穩定因素，令人踏實，他從來不爭。」「從來不爭」——這與徐孔說我父親「不謀私利」相仿，也與趙友慈的印象一致：方老「人如其名，為人：方方正正，做事：實實在在，對人對事平等」。

2003年到《炎黃》工作、先後擔任執行主編和副社長的楊繼繩對方實這樣評價：他「沒有利益和權力欲望」，「以他的資歷地位和性格，起的不是一般的作用，是雜誌社內部的穩定力量，他說的話別人聽，在人事方面起了『黏合劑』的作用」。

杜導正和方實兩人配合得很好。程理嘉說：「《炎黃春秋》靠兩老，他們合作密切，重大事情兩人商量，像一個人一樣，在兩老領導下，沒有烏七八糟的東西。」

在父親的追思會上，杜導正回憶了辦刊過程中和我父親共同經歷的種種磨難，談到與「老方」的關係時，他有些動感情：「我們倆，在所有問題上，編輯、人事、對外關係——大大小小問題上沒有任何矛盾，我們的看法、做法、做派一致」，「我們萬分之一萬地一致，很不容易，空前絕後，在歷史上也少有」。

「萬分之一萬地一致」的說法，也許有些誇張。楊繼繩對我說，你父親是個有獨立性的人，在有些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。徐孔也說：「你父親跟老杜那麼好，他該不同意還是不同意。」因為知道父親秉性寬和，我問

自1997年起就在雜誌社工作的吳思，在處理內部人員矛盾衝突時，我父親是不是「和稀泥」？吳思回答，「是講道理，講道理」，一連說了幾遍「講道理」。

在父親的追思會結束時，杜導正做總結：「老方在《炎黃春秋》起了極好的作用——他的為人、經歷、他受的教育——我認為他核心的東西就是尊重人。」我很認同「尊重人」這個說法，在家裏父母就是這樣對待我們的。將「尊重人」視作我父親的「核心」品格，老杜叔叔說到了點子上。我以為，在父親任事期間，《炎黃》一二把手之間關係的關鍵詞是「互相尊重」。劉家駒就說：「老杜對你爸尊重，兩個人辦雜誌，都會團結人，是非常不一般的領導層，很難得。」

對《炎黃春秋》這樣一份非同尋常、長期承受外部高壓的刊物來說，「領導班子」的精誠團結太重要了。杜導正有識有膽，是把握大方向的人物，在《炎黃》歷史的頭十四年，方實是杜導正最主要也是最有默契的輔佐，用一位《炎黃》朋友的話說，「杜老是掌舵的，方老是壓艙的」。

寫到這兒，有句話要說回來：在我看，說到底，《炎黃》內部的管理方式仍然難免「人治」之嫌，僅靠「老同志」的「德高望重」不夠。這裏先打住，也許在後面我會多說兩句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## 註釋

① 陳岱孫：〈回憶葉企孫先生〉，載劉昀編：《往事偶記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6），頁173。

② 「一二·九」指參加過1935年底爆發的「一二·九」學生運動的群體，「三八式」緣自日本造「三八式步槍」，

用來指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大量加入中共的知識青年群體。

③ 從2006年以來十餘年間我陸續對多人進行採訪，包括十一位《炎黃春秋》工作人員、十六位新華社工作人員，以及《中華英烈》工作人員秦曉鷹和《炎黃春秋》作者尹騏，其中杜導正先生於2006年8月23日和2009年8月17日兩次接受採訪。文章中引文如無特別註明，均出自訪談。

④ 《革命烈士傳》編輯委員會編：《革命烈士傳》，第一至十集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5-1992）。

⑤ 鄧小平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」的重要講話，參見《鄧小平文選》，第二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320-43。關於李維漢和鄧小平1980年的談話，參見溫濟澤：〈李維漢「殘年有志惜晚晴」〉，《炎黃春秋》，1996年第6期，頁40-43；余煥椿：〈李維漢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〉，《炎黃春秋》，2003年第3期，頁1-5。余文寫了李維漢1980年6月19日在家中接待汪子嵩、寧培芬訪問的情況，李詳細談到他不久前與鄧小平見面談話內容，具有重要價值。另參見胡喬木：〈學習《鄧小平文選（一九七五—一九八二）》〉，載《胡喬木文集》，第二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561。

⑥ 李維漢：《回憶與研究》，上、下冊（北京：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，1986）。

⑦ 單世聯：〈李維漢：《回憶與研究》〉（2005年9月7日），愛思想網，[www.aisixiang.com/data/8608.html]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8608.html)。

⑧ 溫濟澤：〈李維漢「殘年有志惜晚晴」〉，頁41。

⑨ 方實：〈「我是一個好黨員」——溫濟澤臨終給自己的定位〉，載方實、楊兆麟主編：《永遠的懷念：溫濟澤紀念文集》（北京：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48。

⑩ 在接受訪談中，李維漢說：「現在是無名英雄沒有人管，我到處提倡，希望報紙雜誌要給無名英雄一個位置」，又說，「對毛主席搞這麼大的紀念堂？馬克思現在有幾個紀念的地方？」訪談中他對中共後來

形成的等級制、終身制和特權化有十分尖銳的批評，參見余煥椿：〈李維漢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〉，頁1-5。

⑪ 關於《烈士傳》和《英烈》的情況，參見方實：〈「我是一個好黨員」〉，頁49-50；李銳：〈記住溫濟澤的最後留言〉，載《永遠的懷念》，頁4-9。

⑫ 《炎黃子孫》為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（主任馮文彬、副主任馮征）屬下刊物，1988年出版。據副主編杜衛東講，該刊在1989年後「因政治原因停刊」，失去了刊號。

⑬ 參見編輯部致讀者的話，《炎黃春秋》，1991年第1期，頁3。

⑭ 我手中有王強華2006年紀念《炎黃春秋》成立十五周年發言的錄音整理稿。王說：「在我們紀念《炎黃春秋》十五周年的時候，我想起一個老同志，……〔他〕就是溫濟澤同志，因為這個事情是我經手的，我知道。當年辦這個雜誌的時候，需要刊號，那麼杜導正同志曾經當過署長，刊號也不能給。……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，溫濟澤同志把他辦的一個《中華英烈》這個刊號捐出來了，……那麼這樣就辦起了《炎黃春秋》，……如果當年沒有溫濟澤同志把那個刊號拿出來，當然以後可能也會辦，但是也可能不能順利的辦起來了。」〈紀念《炎黃春秋》創刊十五周年專輯（下）〉簡要提及了王強華發言，參見《炎黃春秋》，2006年第10期，頁75。

⑮ 杜導正：〈《炎黃春秋》的春秋〉，《炎黃春秋》，2001年第7期，頁70。

⑯ 〈編者寄語〉，《炎黃春秋》，1994年第1期，頁1。

⑰ 杜衛東：〈悼耀邦——耀邦辭世四周年祭〉，《炎黃春秋》，1993年第4期，封底內頁。

⑱ 本刊編輯部：〈尊重史實是本刊辦刊的原則〉，《炎黃春秋》，1995年第1期，頁4。

⑲ 〈關於紀實文章必須真實的討論〉，《炎黃春秋》，1995年第1期，頁83。

葉維麗 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  
波士頓分校歷史系教授（已退休）。